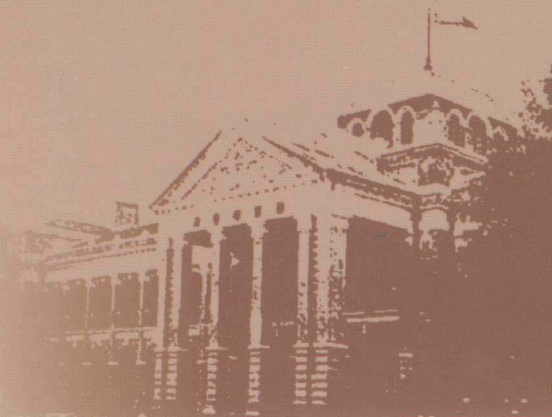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

(续集)

XinHaiGeMing YanJiu Ji QiTa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 (续集)

XinHaiGeMing YanJiu Ji QiTa

主 编◎王兴科
副主编◎严 威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 - 7 - 216 - 06763 - 8

- I. 辛…
- II. 辛…
- III. 辛亥革命—研究
- IV. 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7251 号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
(续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字数:309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763 - 8

印张:19
插页:2
印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红楼人的新创获

严昌洪

并不是有红色墙体的楼房都叫“红楼”，而历史上被称为“红楼”的房子，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北京大学的“红楼”，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又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场所，那里可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而我们这里所讲的“红楼”，在清末是湖北咨议局，在民初是鄂军都督府，在现在是武昌起义纪念馆，它是辛亥革命的见证。这里所讲的“红楼人”，指的就是该纪念馆的同仁。

16年前，红楼人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当时，我写了题为《红楼人的新成就》的读后感，称该书是“该馆1981年正式开馆以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又一次集中展示。与以往该馆所编著出版的成果多为图集、画册、资料汇编、工具书等不同，本书是该馆专业人员所撰写发表的各种学术文章的结集，既反映了该馆的整体水平，也反映了该馆的最高水平”。又写道：“读了此书，对这些朋友们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他们的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尤其是了解到红楼人为将纪念馆建设成为文物收藏中心、史实展览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进行了如此脚踏实地的工作，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表示敬意。”最后我表示：“我相信，随着馆中人员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学术研究的兴趣日浓，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果不其然，我的这个“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

现在读者手上的这本书是《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的续集，而我这篇小文也可算是前文的“姐妹篇”。我将续集与16年前的集子作了比较，发现红楼人参与学术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有了续集中更多更好的作品。不仅所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作者队伍的涵盖面更宽，全部是馆里员工，没有像前书那样收录作为该馆兼职人员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们的文章，除了

研究人员外,管理人员、讲解员和一般职工也提交了不错的文章。文章涉及的内容也更广泛,不仅像前书那样有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论文和探讨文博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文章,还有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和谐文化”、“文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的人文关怀”、“现代企业的会计政策”,等等。而且,辛亥革命研究和文博工作研究的视角开阔了,领域也拓展了,诸如清末民初的社会、革命团体、革命思潮、革命运动、历史人物以及首义文化、首义精神、首义遗址、历史文物、辛亥纪念,等等,都有文章探讨,有的文章还很有深度。举例说明如下:

《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一文,对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对“辛亥革命”一词的各种解读进行分析,认为“辛亥革命”一词诞生于民国成立多年以后,此后其结构形式稳定,但其内涵则不断流变,在该词所包括的事件主要过程、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结果等方面,含义或扩展或缩小,未能达成共识。抽象名词的难以准确界定、纪念语境以及党争政争是“辛亥革命”解读如此分歧的重要原因。

2 | 《黎元洪与民初政争》一文,对黎元洪与民初政坛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认为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并称“民初四巨头”的鄂军都督黎元洪,因拥兵八镇,在民初政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民初政争中,黎元洪频频发表政见,提出自己的政治意向。在定都问题上,欲定都武昌,左右南北局势;在组阁问题上主张南北混合;“张振武案”为袁世凯所掌控,逐渐倒向袁世凯;在借款问题上抑南扬北;对待“宋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南方用武;“二次革命”支持北方动武。文章还分析了黎元洪支持袁世凯的原因,并指出黎元洪并未完全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在题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的文章中,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出发,指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见证了中国统治秩序、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新旧交替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文章提出了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分析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利条件,指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文章认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可行的。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对首义文化这一概念作了详尽的阐释,认为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即武

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界颇受关注,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这些文章富于创见,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表明红楼人的科研水准有了大幅度提高。《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一书的出版,值得祝贺!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他 (续集)

序:红楼人的新创获 严昌洪 / 1

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 何 广 / 1

宋庆龄论辛亥革命 王兴科 / 16

武昌起义是近代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 官 薇 / 22

谈科学补习所 余汉涛 / 30

简述武昌日知会革命实践活动 余汉涛 / 36

止沸

——湖北当局对 1908 年汉口摊贩风潮之处置 何 广 / 43

辛亥革命前后毕业考试制度分析 李媛丽 / 56

第一幅完整构架汉口商业大都市的宏伟蓝图

——解读孙武的《汉口市政建筑计画书》 严 威 / 63

海外阅历与孙中山对西方国家的幻想 黄春华 / 73

孙中山的体育思想和实践 李媛丽 / 80

放弃武昌与黄兴评价 王兴科 / 84

黎元洪与北伐黔军的命运 严 威 / 96

黎元洪与民初政争 严 威 / 106

论章太炎与黎元洪的交谊 黄春华 / 120

论蔡锷民初的党派关系和政治理念 王兴科 / 126

论蔡锷的政治倾向 蔡汉宁 / 132

张竹君与阳夏保卫战 陈予安 / 140

民国“湖北三怪”之石瑛 黄传馨 李媛丽 / 144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对湖北的深远影响 官 薇 / 151

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 梁华平 / 159

浅谈徐恕藏书 徐力田 / 171

中山舰的文物价值及其意义 梁华平 / 176

从两件文物看张之洞与士流 何 广 / 182

楹联中的“共和”

——《共和新楹联类编》介绍 黄春华 / 186

雕版凝历史 墨线绘共和

——记一块辛亥革命木版年画雕版 刘 昕 / 190

大壁小识 陈小飞 / 193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 王兴科 / 197

论首义精神 黄春华 王 强 / 209

谈谈辛亥武昌首义文化区建设规划的设想 梁华平 / 224

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 梁华平 严 威 / 228

保护首义文化遗产,彰显武汉名城风采 李媛丽 / 240

首义遗址的整合 朱保平 / 248

武昌地区首义遗迹资源的整合 吴 华 / 250

浅谈建设和谐文化 蔡艳青 / 253

简论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 梁华平 / 258

论博物馆产业化 王兴科 / 265

漫谈修辞在讲解中的运用

——以讲解辛亥革命博物馆为例 陈小飞 / 273

理清关系,解决矛盾,促进文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袁 磊 / 276

公共图书馆建设趋势浅谈 李雪梅 / 280

试论图书馆人文关怀的内涵与实践 李雪梅 / 286

浅谈现代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 王卫华 / 292

编 后 王兴科 / 297

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 “辛亥革命”(1912—1949)

何 广

“辛亥革命”如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我们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①。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从名词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变迁。本文拟选取民国年间《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刊载的双十纪念文章为研读对象,专力探讨在纪念之中“辛亥革命”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名词的诞生^②

“辛亥革命”是偏正结构词语。“辛亥”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本词中对应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8日。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成功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响应,一举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以干支结合其他名词组成新名词所在多有,常用来指称某时发生的某事,中国近代史中比较习见的名词,如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

^① 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② 本文撰写后,笔者挖掘史料,发现民国初年即有以“辛亥革命”命名的书籍出版,其一为1912年6月,署名为渤海寿臣者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一书;其二为同年廖少游(字春)编辑(署名草莽余生)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然而在报刊上民初该词运用并不常见。

子之乱、辛丑条约,莫不如此。

“革命”是本词的中心语。汉语中最早出现“革命”字样的是在《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中,其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汤武革命”作了注解,他说,商汤、周武王“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革命一词的古义可理解为变更天命,改朝换代。

到近代,“革命”意义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有一条重要途径,即先由日本对西方词汇进行转译,形成新词语,或赋旧词以新义,并经留日学生辗转输入国内^①。“革命”属于旧瓶装上了新酒,梁启超对此作了系统的介绍。他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革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 Revolution 之意也”。“Revolution 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在这篇作于 1902 年底的文章中,梁启超反复申说 Revolution 并非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易姓者固不足为 Revolution,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在其理解中,日本人翻译的 Revolution 实际无关“改朝换代”,其合理翻译当为“变革”。对于被误解的“革命”,梁启超给出了他的正解:“夫我(国)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②简言之,梁氏的“革命”乃无须改朝的换制。

梁启超成文之际,革命在中国几成流行语。昌言革命,以革命为题的书籍如《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也辗转流传。显然,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理解不尽相同,伴随着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展开,留日学生对革命的古义和译义兼收并蓄,大加宣传,革命不但要“革其王命”,“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革命遂成为改朝换制的举动。

但“辛亥”与“革命”连在一起,还是民国成立多年以后的事情。民国初肇,

①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 Masini)在其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版)一书中对此作了甚为详细的探讨。

② 梁启超:《释革》(1902 年 12 月 14 日),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8~371 页。

“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奇怪的是，报纸以及政府公文中均未见“辛亥革命”字样。从现有材料看，尽管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探讨得最多最力，他在早年也惯用武昌起义、辛亥一役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对民国前后的历次革命进行追述，也不见“辛亥革命”字样。他说：“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三次革命在云南，因袁世凯推翻共和，僭称洪宪皇帝，南方各省拥护共和，所以有护国军之役。四次革命则今日，因倪嗣冲造反，而有张勋之复辟。”^①直到1918年3月18日，孙中山在致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辛亥与革命两词的距离才比较接近。信曰：“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②犹未明言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名称较早出自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笔下，1919年8月他发表于《湘江评论》中的著名政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辛亥革命”喷薄而出。1921年梁启超在国庆日以辛亥革命为题演讲，题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③一文，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稔知，遂成流行语，以迄于今。

二、词义的盈缩

辛亥革命词义内涵包括事件过程、革命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和结果等多方面，民国期间，纪念文章中所言诸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尽相同但有迹可循的解读，该词的内涵为之左右，其意义随时代演进，时而缩小，时而扩大，一直未能稳定下来。以下试作梳理。

① 孙文：《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

② 孙文：《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1页。

③ 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1924年10月8日），载《向导》周报第86期，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0～794页。

1. 事件的过程

较早提到“辛亥革命”一词的毛泽东,在1919年是这样描述革命过程的:“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①毛泽东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成果。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八年今日》一文中描述史事更加详细:“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皆欲效忠异族,残杀同胞而剿灭革命军者也。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篲,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以挽危局,而定国本,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②孙中山结合个人的经历,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文中未明言“辛亥革命”,但此后对辛亥革命的论述,均以此为中心内容。

以上的表述基本界定了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可视为辛亥革命的初始含义。基本过程为舆论宣传和准备,武昌发难,民军和清军激战,各省响应,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帝制,共和底定。

2. 革命的施动者

辛亥革命的施动者是谁?这是辛亥革命定义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民初民众瞩目的民国元勋是作为群体的革命党人和牺牲的先烈。民间舆论对其不吝赞词,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② 孙文:《八年今日》,《申报》1919年10月10日。

有文章称“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是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①，“诸先烈既糜无数代价，以造成民国之雏形”^②。革命党人也获得了很高评价，舆论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③，目光聚焦于武昌首义之际革命党人，而“党人”、“民党”等词语也是纪念文章中常见词。结合上下文，这些词也有大致的语义边界，所指称的当是身与创建共和武装斗争的仁人志士。北洋政府时期的革命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官民心中，其施动者的身份是模糊和抽象的。

较早使用“辛亥革命”一词的毛泽东，在1919年突出地指出两方面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他说：“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④革命党和咨议局并为辛亥革命的主持者。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立宪巨擘梁启超的唱和。1921年梁启超在演说中称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内，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与同盟会分途并进的立宪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似乎特别看重“革命党”的头衔。他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这些革命党人“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

① 《国庆日感言》，《申报》1919年10月10日。

② 庸：《国庆日感言》，《申报》1922年10月10日。

③ 默：《今日之日》，《申报》1912年10月7日。

④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进线的结果”^①。“革命党”大而化之,顺理成章地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当然,这与他此前对“革命”的独特理解是相吻合的。在毛泽东和梁启超的言论中,可以看到革命党(同盟会)和立宪派(咨议局)是辛亥革命并列的推动者。

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然而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是飘忽不定的,趋势上看是低开高走。民元《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大加丑诋。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司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②。对孙中山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③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1913年双十的共和纪念会继续举办,“然其中之人物风景,实今昔大异”,“黄与孙文诸像,则一律闭置之于一室焉”^④,作为革命重要参加者孙中山和黄兴的肖像竟然不能让人瞻仰!

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历史地位有了颠覆性的转变,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他逝世之后,中国国民党举行了大张旗鼓的哀悼活动,纪念文章述及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关系时,其称谓已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称他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⑤。1927年10月已被“清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庆宣言书中,依然坚决举起“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⑥。国民党员认同“近代中国之革命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之领袖”^⑦,

①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5页。

② 《大公报》1912年10月10日。

③ 《中华民国之元年开国周年纪念会议》(再续),《大公报》1912年10月10日。

④ 黄远庸:《黯日日记》其二,《远生遗著》卷2,《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据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影印版,第182页。

⑤ 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记〉发刊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⑥ 《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⑦ 《十七年国庆纪念辞》,《大公报》1928年10月10日。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现出来。此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罕有形象模糊的革命先烈,也不再出现“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领袖。

到国民政府时期,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名单中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和“孙中山”并驾齐驱的辛亥革命双主语。在表达手法上,要么二者并用,如“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无数志士,尽瘁革命”^①;更多的时候是只提“本党”。如“本党在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推翻了满清,光复了我汉族,创立民主政治,使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②,辛亥革命是“吾党先烈创造艰难之丰功伟绩”^③。1928年“双十节是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的纪念日”的标语张贴于上海大街小巷。1943年国庆日有文章径称“三十二年前的今天,是中国国民推翻满清专制,创造民国的一天。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国民党”^④。“党”开始从孙中山的光环背后浮现,形象也日见清晰。

3. 时间范围

在孙中山早期言论中指代的辛亥革命,无论是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提及的“我国去年之革命”^⑤,还是1917年的“一次革命”^⑥有着极为明确的时间范围,均止于农历辛亥年年底的民国建立。伴随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的步伐,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在慢慢放大,表现为时限向后延伸。在国民革命高唱入云的时代背景下,1928年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的宣传大纲中说“双十节是中华民族革命成功的纪念日,是恢复中华民族地位的纪念日,是中国国民革命初步成功的纪念日”^⑦。1943年《中央日报》上尚有人明确宣称,“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乃是第一期国民革命的时间”^⑧。辛亥革命已然成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其时限愈发模糊难明了。

① 《国庆纪念告民众书》,《申报》1928年10月10日。

② 《国庆庆祝声中市党部唤起百万民众》,《大公报》1928年10月10日。

③ 孙科:《双十节意义之认识》,《中央日报》1929年10月10日。

④ 张道藩:《国民努力的方向》,《中央日报》1943年10月10日。

⑤ 孙文:《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8页。

⑥ 孙文:《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

⑦ 《申报》1928年10月10日。

⑧ 洪瑞钊:《辛亥革命的再认识》,《中央日报》1943年10月10日。

4. 性质

由于辛亥革命一词定名较晚,此前含义与其相近的词汇有“武昌起义”、“一次革命”、“光复”、“辛亥之役”等等,对这些词汇所指事件的评价,为日后人们对辛亥革命性质评价所承续。自民国建立以来,对于那场建立民国的革命就形成了是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的认识,不过这些解说之中,各有偏重。

一是专指其政治革命性质。民元民间舆论对于政治革命之说赞同颇多,《申报》双十纪念日时评中,有的说这场革命是“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①,有的说今日之民国较“武昌起义之前,偃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已大有不同^②。

另一种专指其民族革命性质。1912年《申报》中有纪念文章回顾革命,感叹“我国民苦满清专制久矣。自去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义旗一指,各省景从,不及旬日之劳,遂建共和之盛举。四千六百九年之旧物光复于一朝,扫二百六十六年之淫威尽除于一旦”^③。突出清王朝的民族身份,以“光复”一词,强调华夷之辨,话语中隐含着强烈的民族革命之义。直至1921年10月,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中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及“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④,也突出了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性质。

还有一种认为是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行。1912年4月,梁启超认为“今兹革命,虽曰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然种族革命,其事为具体的,诉诸感情足矣,故尽人能焉,合全国之力以赴之,遂以告圆满之成功;政治革命,其事为抽象的,必须根据于理解,非尽人所能喻也,故怅怅焉若无所著手,冥行擗埴,成功杳不知何日”^⑤。虽肯定二者并行,但对于政治革命是否成功则不无保留。而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⑥。

自此以后,辛亥革命双重性质的定位被中国国民党继承,并广泛宣扬,遂成主

① 《国庆日感言》,《申报》1912年10月10日。

② 寒:《民国创造一周年之纪念》,《申报》1912年10月10日。

③ 默:《今日之日》,《申报》1912年10月7日。

④ 胡适:《好政府主义》,《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⑤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年4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5页。

⑥ 孙文:《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8页。

流认识。1930年国民党宣传部门发出的标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庆致辞中,特别提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首先“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满清,造成了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权方面,就是结束了四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造成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①。

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一定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蛰伏于满清异族宰制之下的中华民族,卒将满清专制政府推翻,而建设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②。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辛亥革命虽倾覆了满洲人的统治,但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③,则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还有文章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表示“辛亥革命的伟大,在于它终结了亚洲封建专制巨擘满清的政治生命,摧毁了腐朽的旧社会,建立起局势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于整个帝国主义实力所支配的殖民领域中,竖起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开启了一条独立解放的光明大道”,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④。

5. 结果

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辛亥之役”,还是“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促成了民国的建立,这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蕴含于国庆和元旦等节假日中的革命纪念活动,往往洋溢着喜庆色彩^⑤。从纪念活动本身看,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庆者,告成之谓也。故成则有庆,败则无庆”;“庆者,行乐

① 林森:《纪念国庆当切实奉行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10月10日,第717页。

② 《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申报》1927年10月10日。

③ 《国庆庆祝声中市党部唤起百万民众》,《大公报》1928年10月10日。

④ 潘公展:《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央日报》1940年10月10日。

⑤ 民国期间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情形,可参阅拙文《辛亥革命纪念述论(1912—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